

张化东回忆录

一九九六年六月

前 言

今年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75 周年，回忆 75 年的伟大历程雄辩的证明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；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强大；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抚今追昔，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，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繁荣、富强、统一的国家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，除有正确的理论、路线和方针政策外，还要有政治坚强、作风正派的干部队伍，使用干部要任人为贤，不要任人为亲，要搞五湖四海；必须要纪律严明、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己，遵纪守法，拒腐防蚀保持清正廉洁；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建设祖国。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，密切联系群众，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好传统，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基础。

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，一

切为公的党，要牢记必须维护群众的利益，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。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开拓前进，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，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。

今年是我参加党 60 年，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，认清形势，坚定信心，同心同德，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发挥余热。

回忆许多先烈前仆后继，遵照党的宗旨和原则率领千百万群众，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英勇拼搏，直至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。我要永远保持和发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不怕牺牲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宁死不屈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，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。

我除在延安马列学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年多时间外，多数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风华正茂，黄金时代的年华。我怀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用最

大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，在党中央领导下，克服无数次巨大艰难险阻，走了许多坎坷路程，和全国人民一道战胜了国内外敌人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根据中央命令，组成八路军挺进纵队，首批挺进到东北沈阳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，转战在北满地区，退到哈尔滨后，奉命由刘亚楼、叶季壮和我全权代表东北军区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谈判贸易，从此，我服从组织安排改行做了外贸工作至今。我从事多年经济工作最深刻的体会是：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，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。

我今年82周岁——已正式离休，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做些微不足道的工作，在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，经过许多重大事件，而有的事件我是参予者，但我仅是一个马前卒，起个小卒的作用。当满天乌云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我是个受害者，坐牢长达四年半之久。当时虽处在艰难困苦中，我决不灰心丧气，坚决

进行斗争，相信我们伟大的党一定会走上正确航程。

回忆往事已大江东去，而现已到耄耋之年，脑力不足，文采欠佳，谨将走过的坎坷崎岖的路回忆记录下来，辞不达意，文字粗糙，仅供后人评说。

张化东

一九九六年六月

目 录

- 一、“九·一八”事变使我走上革命道路 (2)
- 二、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 (6)
- 三、参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,亲手活捉蒋介石 (8)
- 四、到绥远省(现内蒙古自治区)西部垦区做
 农民工作 (26)
- 五、到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工作 (30)
- 六、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东北干部训练班学
 习 (32)
- 七、到晋察冀边区分局,成立冀东东北工作
 委员会 (36)
- 八、选择“滦东”作为向东北开辟抗日根据
 地工作 (38)
- 九、奉中央指示,率八路军挺进东北纵队
 到沈阳 (56)
- 十、转战在沈阳北郊地区,根据东北局决

定,成立辽西第一军分区	(71)
十一、走上对外贸易工作的起点	(80)
十二、新中国成立后,参加周恩来总理率 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	(97)
十三、出席毛主席在驻苏联使馆召开座谈 会	(103)
十四、赴莫斯科我驻苏联商务参赞处任首 席商务参赞	(112)
十五、参加编写进出口货物工作业务手册	(127)
十六、根据国务院决定,调到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工作	(129)
十七、文化大革命受迫害	(133)
十八、从事新的工作	(139)
十九、结束语	(143)

我原名张保中，曾用名李克，祖籍山东省蓬莱县，两位祖父共有我父亲和叔父八人，全家兄弟姊妹共有四十余人，人多土地少，因之逃荒到辽宁省西丰县开垦荒地。我于1914年6月出生于西丰县，六、七岁在家中帮助放牧，有时也做些农业耕耘事情，因之从年幼即熟悉农村一些情况，使我自幼就有在基层锻炼的机会。

我父母生我们弟兄三人，我是最小的，因之深受父母的喜爱，经常教育我要用功多读书，争取读完大学再工作，尤其对中国古典书籍更要多读。例如：论语、孟子、中庸、诗经、左传、易经、春秋、古文观止、唐诗等一定要读，因为这些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。因此，在我村有廿余名小孩请了一位私塾教师黄尔忠任教，据说他是清朝末年的秀才。我读了六年私塾，后考入白石村高小读了二年，约于1929年考入西丰县中学，读了三年中学，恰好中学这一年，正是日本侵略者张开魔爪全面侵略东三省的时刻。

一、“九·一八”事变使我走上革命道路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，在沈阳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从此，在几乎刀不血刃的情况下侵占了整个东北，使东北3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，任其宰杀和奴役，这样轻而易举的侵略成功，助长了它大规模侵略全中国的狼子野心。今日中国人民英勇站起来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英明领导下，打倒日本侵略者，建设新中国，我们应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，以戒于今后，教育我们后代，国耻不能忘，历史不能重演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我正在西丰县中学读书，日本军占领沈阳后，约一个月时间即到了西丰县，到后除向广大群众宣传示威外，即到西丰县中学，将学生集中到公园中训话，日本兵将学生团团围住，不许说话和乱动，日本军头目讲话的大意是，日本天皇派他的皇军到中

国来给中国人建设“王道乐土”，谁要反抗割杀勿论。我身旁即站一个日本兵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将枪上的刺刀放在我的脖子上说：翻译官说：“你的懂了没有，谁要抗日死了死了的有”。我当时觉得脖子上刺刀凉的很，我稳身不动，态然自若，脑中转了一下，你说什么我是一言不发，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等我把钢枪握在手中时，再和你们拼搏，我下定决心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到底，终有一天叫你们这些魔鬼低首投降，鞠躬道歉。当时我虽然只有 17 岁，但对我的刺激和震动是很大的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驱逐国贼，不能允许侵略者玷污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中华民族，凡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掉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这个国耻的日子。

在公园被日军头目训了一顿，回到课堂大家议论纷纷，正好教化学的张心一老师来上课，大家问他怎么办？他未说什么，已胸有成竹，他于 1932 年初成立西丰县中学抗日救国会，是我校共产党的领导者，随即吸收我做会

员，和该校中的十六班同学高达深、赵一鹤、范正印等编为一个小组，约于1932年秋即被日本特务侦知，张心一老师告诉我们，抗日救国会事被日方查知，他拟速赴关内北平去工作，他说他怀中带一瓶硫酸，如果被捕他即自杀。并告知我们情况紧急亦不可久留，需迅速去北平找东北救亡总会接关系，便于继续工作。果然在张老师走后数日，即被日寇大肆搜捕，幸亏我们事前得悉，离开学校躲到乡下一个时期才免遭此难，我在乡下躲避一个月后回家，我父亲说：“你教师让你去关内北平找东北救亡总会很好，你要快些离开家为上策，日本人最残忍毒辣，抓住后你一定要死于屠刀之下。”此时我家六叔父张传声在北满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，被日军战败后，逃回家中，因之，我父亲即给我们二人拿了五十元银元作路费，令我们二人迅速奔赴关内北平。当我离家时，我父亲嘱咐两句话：“一是必须将日寇驱逐出中国再回来，否则你回来也会被日本人杀掉；二是必

须要念完大学再到社会上做事，人没知识是做不了什么事情的。”但我老父因小儿离家逃亡，心中甚是悲痛，涕泪交流，一直望到火车走得很远，我还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，给我留下一个生离死别，人生难忍的痕迹，随即赋诗一首：

老父送儿赴征途，
被迫相别实酸楚。
应学岳飞保国土，
誓将倭贼永驱除。

1933年初，我逃到北平，与在西丰县中学赵一鹤等同学会合后，我即一方面继续搞抗日救亡工作；一方面在二龙路弘达补习学校补习功课。于1934年春考入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，和朱川、宋洁涵、沈越、刘希文等是同班同学，宋黎同志是在东北大学代表党领导我们进行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者。

真不出我所料，1963年我到日本时，日本退伍军人友好协会会长来宾馆拜会我，此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，是华北侵略军司令中将岗村

宁次郎，他为了表示悔过和中国友好，届时他一迈进门，即向我以日本式九十度大鞠躬三次，然后，他说：“我今天来一是向你道歉，二是表示友好。你是捉过蒋介石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日军和八路军作战总是打败仗，原因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首先谢谢你的好意，日军打败仗，我一句话就说清楚了，你们是侵略者，对中国人民残酷镇压，树敌太多，老百姓痛恨你们，八路军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，最终必定战胜日本侵略者。”

二、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

1935年冬，我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随后又参加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，与反动派当局斗争时，担任突击队员和交通员等职务。突击队员大约有二、三十人，带队的人有杨铁民、刘耀权和我。突击队员最起作用，“一二·九”那一天，警察把东北大学大门堵住，当局反动派说，东北大学的学生都是亡命

徒，只要他们不上街即闹不起来。我们突击队员研究后，每人身上带两包用报纸包的炉灰粉末，靠近警察时，我们几十个人突然一起将炉灰迎头抛出，将警察眼睛迷住了，他们顾不得堵学生，只顾揉眼睛，我们趁机冲出去，大队人马随后即来到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集合地点。

在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后，华北局势逐渐紧张，日本侵略军步步前进，北平已朝不保夕，东北大学非迁移不可。此时东北大学分为两派，左派主张把东北大学迁往西安市，因为张学良将军是东北大学校长在西安，又主张抗日救国，可以就近指导；右派主张南迁开封与国民党靠近。我与宋洁涵、朱川等同学一起，于1936年初到西安。到达西安后仍是一方面读书，一方面进行抗日救亡运动。在星期日或假期，到附近工厂、农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，演讲、演戏、搞夜校俱乐部等。

1936年7月，我和原东北大学在北平搞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的东北大学领导者宋黎

同志接上了关系。他住在西安城内西安大旅社，去时经常谈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和形势。此时我向他提出，我不想念书，想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，宋黎同志说：“那很好，现在张学良成立一个学兵队，召集参加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的一些积极分子，但这是学习当兵，受严格军事训练，并全面学习一些抗日救亡知识，然后派到东北军各部进行政治工作。”当时我很高兴，久想参军不得其门，当即请他介绍，因之在1936年8月初，我到西安城门楼上东北军学兵队队部报到，大队长是康洪泰，现改名为康博纓，他接见我后，令我到学兵队一连一班与郭峰、吴铎等同志编在同一个班。

1936年8月底，经富纪纲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三、参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，亲手活捉蒋介石

西安事变爆发以前，张学良、杨虎城两将军在我党的争取和协助下，积极进行改造部队，培养抗日力量的工作。他们除了共同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，训练东北、西北两军连长以上，团长以下的军官之外，东北军还成立了一个学兵队。这个学兵队有 300 多人，大部分是我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去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，其中很多人是参加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大、中学生。队员经过政治和军事训练后，分别派到东北军各部队去担任政治教育工作。学兵队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，为了严格保密，受训青年一律不准随便下城门楼。我当时是学兵队一连的一名队员，从 8 月到 10 月在城门楼上受训三个月。

10 月底，我被派到张学良的卫队二营第七连当指导员，公开名义是连副（我军称副连长），在连队中成立一个战士俱乐部，以俱乐部的名义开展抗日政治宣传活动，在这些活动中物色比较进步的战士，先吸收加入抗日救国

会，然后再逐渐发展成为党员，自1936年10月到12月，发展抗日救国会员20余人，发展党员约五、六人。卫队二营装备比一般部队好，每人一支盒子枪，一支马枪，每班一挺轻机枪。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以及东北军的所有机要处所，都由卫队营担任警卫。

12月9日，西安各校学生在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，为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一周年，要求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，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请愿运动。事先，组织上交给我一项任务，即带领60名左右士兵，装扮成学生，参加游行队伍，以防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，保护青年学生的安全。这天，请愿队伍先游行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，要求省主席邵力子出来接见。邵力子派他的秘书长代见，讲了一套敷衍搪塞的话。请愿学生坚持要求邵力子亲自接见，邵不得已，才出来讲了番话。他虽然表面上赞成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，但又说：“我手中没有一兵一卒，要抗日请大家去找张副司令和蒋委员